

略論佛教如何初傳日本

■ 鄭涵云

佛教，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，不但是構成亞洲文明的重要元素，也深刻地影響了亞洲人民的精神生活。在六世紀東亞各國的合縱連橫之下，佛教自朝鮮半島傳入日本，亦是上古東亞區域文明傳播的一頁篇章。只是佛教傳入日本的確切年代，由於史料依據的不同而有所疑義；而大和朝廷對於乍現眼前的佛教文明，又抱持著何種態度呢？

從百濟到大和：日本佛教的黎明

佛教發源於印度，之後逐漸推展至中亞，約於一世紀傳入中國，於四世紀末至五世紀初，廣及朝鮮半島。並於六世紀時傳入日本列島，至七世紀末開始廣泛流傳；經過歷代發展，佛教成為日本的主要宗教，直至今日。自新石器時代至六世紀末的遺址中，有不少進行祭祀的痕跡；一般認為在佛教傳入日本之前，倭人即存在著原始信仰，認為萬物皆有神靈。但是，此時的信仰形態，不論是教義系統、神職人員制度、宗教設施、供奉禮拜的對象等，都還處於尚未完備發達的狀態，應只停留在後日「神道」的原始階段，無法與具備最新技術（寺院建築、佛像的建設營造）與高度美感造型（佛像、佛畫）的佛教信仰相提並論。

根據考古發掘的成果，日本列島最初期的佛教文化遺址以飛鳥（今奈良縣高市郡明日香村附近）一地為核心，散見於周邊的奈良與大阪，而目前也並未在其他地區發現早於飛鳥的佛教遺址。因此日本真正的佛教文化，應始於飛鳥一地。然而，飛鳥的佛教文化，究竟是由

誰帶來的呢？

日本佛教的源頭，不論是從文獻史料，或是考古發掘的佐證，皆指向來自朝鮮半島的百濟。公元前一世紀中至七世紀的朝鮮半島，分為高句麗、百濟與新羅共三國鼎立，史稱「朝鮮三國時期」。三國中最早接受佛教的是高句麗；據《三國史記》記載，前秦苻堅於小獸林王二年（372），將佛像、經典贈與高句麗小獸林王，為佛教傳入朝鮮三國之始。¹至於百濟則是在枕流王元年（384），由印度僧人摩羅難陀自東晉帶來佛教，隔年（385）即在漢山建立寺院。新羅則遲至法興王十五年（528），才自高句麗傳入佛教。文獻記載六世紀時日本從百濟傳入佛像及造佛工匠、也從新羅傳入佛像。《隋書》〈倭國傳〉也記載：「敬佛法，於百濟求得佛經，始有文字。」認為日本佛教傳自百濟。

《日本書紀》〈卷第十九·欽明天皇紀〉（圖1）中，對於佛教如何傳至日本，更有以下記載：

冬十月，百濟聖明王更名聖王，遣西部

姬氏達率怒喇斯致契等，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、幡蓋若干、經論若干卷。

由上可知，在欽明天皇在位期間，百濟的聖明王遣使來到大和朝廷，將一尊佛像與若干佛具、經典贈與欽明天皇。

《日本書紀》是日本最初敕撰的國史，仿中國正史體例，成書於養老四年（720）。惟在現代歷史學家的批判性分析之下，認為《日本書紀》所載內容，多有並非基於公正客觀之事實，而是皇室爲了形塑自身的正統性而作。²但即便如此，根據考古發掘及史料比對，佛教於六世紀中從百濟傳至日本，是公認的事實。惟《日本書紀》自國史的立場出發，重視佛教在國家之間的正式傳來，即百濟與大和朝廷之間國家層級的贈與（日本史學界稱爲「佛教公傳」），而非其他途徑的傳入。

但是，佛教公傳的確切時期，卻由於史料記載的不同而有所爭議。《日本書紀》所載，

百濟遣使贈佛爲552（欽明天皇十三）年。但除了《日本書紀》以外，卻有流傳於古寺院的史料《上宮聖德法王帝說》與《元興寺伽藍緣起并流記資財帳》等記載，欽明天皇在位的戊午年間（即538年，宣化天皇三年³），百濟聖明王遣使，將佛像、佛具、經典贈與欽明天皇。這些史料在經過分析研究之後，雖然成立的時期各有疑義，但大致公認記錄了古寺院飛鳥寺與法隆寺中對佛教公傳的看法。⁴但除了寺院流傳的史料之外，只有《日本書紀》將佛教公傳定爲552年。爲何只有《日本書紀》與其他的史料出現差異？有學者認爲，552年是《日本書紀》作者所設定的年次；在中國，經過了北周武帝的廢佛，552年（即南朝梁元帝承聖元年、北朝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）是所謂的「末法之世」。⁵而在經過多重史料的比對之後，目前日本學界大致採取538年爲佛教公傳之說。

從另一方面來看，爲何六世紀的百濟，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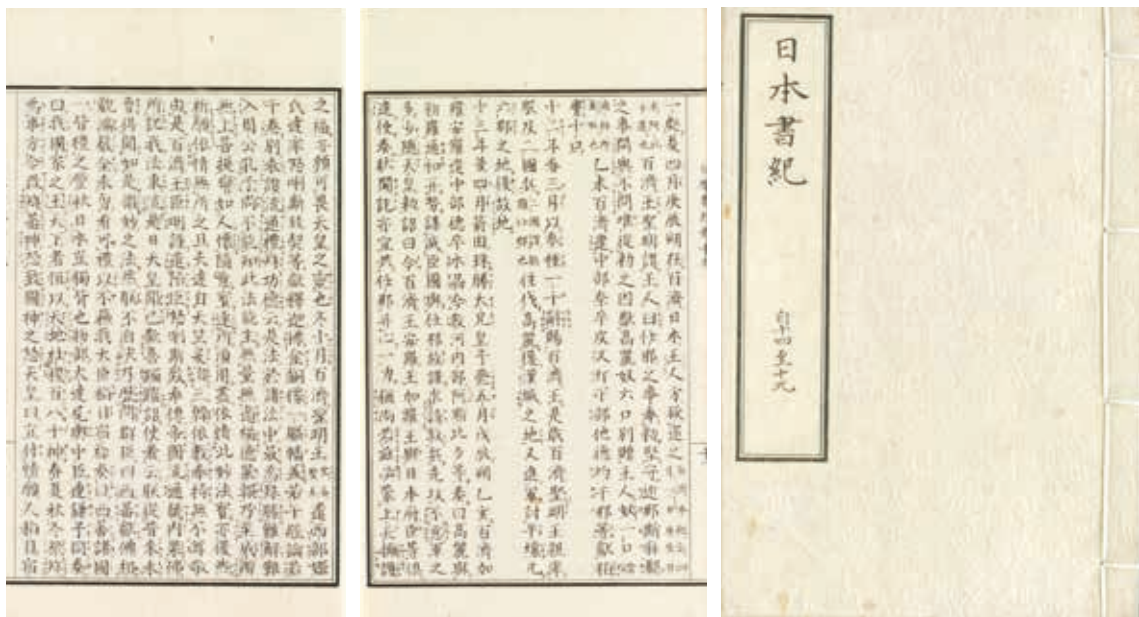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(日) 舍人親王編 《日本書紀》第四冊 卷19 日本明治十六年佚存書坊石印巾箱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012013



圖2 韓國 三國時代(百濟) 6~7世紀 如來三尊像(日本重要文化財) 銅鑄鍍金 主尊高28.1公分 左脅侍高20.9公分 右脅侍高20.6公分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法隆寺獻納寶物N143號 取自長岡龍作編,《日本美術全集·2·法隆寺と奈良の寺院(飛鳥·奈良時代1)》,圖112。

特意遣使將佛教文物贈與大和朝廷呢？當時的百濟，迫於北方高句麗的軍事擴張，不得不在538年第三次遷都，從熊津（今南韓忠清南道公州市）遷都泗泚（今南韓忠清南道扶餘郡）。除了高句麗的威脅，當時的百濟持續與新羅進行軍事抗爭，在軍事、外交上皆處於危急的情況，急需倭國援助。百濟將佛教相關的文化財產贈與大和朝廷，被認為目的在於期待倭國的軍事支援。倭國在五、六世紀時，數次應百濟之請，援以兵器、食糧、衣料、士兵；而百濟則以學者（五經博士、醫博士、易博士、曆博士等）、技術與技藝人員（採藥師、樂師等）以及書籍（儒家典籍、卜算書、曆書等）送與倭國，應是對倭國軍事支援的謝禮。佛教，亦是百濟對倭國的禮尚往返之一。⁶

另一方面，在百濟對大和朝廷間的正式贈與前，來自朝鮮半島、中國大陸的移民社會，即可見到佛教信仰的痕跡；移民（日本稱之渡來人）們將佛像帶至日本，進行私人的禮拜活動。法隆寺獻納寶物共有四十九組、共五十七尊的金銅佛像，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，高度多在50公分以內，應是因應這一類私人的禮拜供奉。成書於十二世紀末的編年史書《扶桑略記》〈卷三·欽明天皇一三年條〉中便曾記載，漢人司馬達止攜來佛像，於大和國高市郡（今奈良縣高市郡）結堂禮拜。⁷然而，即便有若干的私人傳入途徑，今日所公認的佛教初傳日本，仍是經由正式外交途徑的公傳一途。

來自百濟的金銅佛

前文引用《日本書紀》記載，百濟使者獻上「釋迦佛金銅像一軀」；令人好奇的是，當時獻予日本的金銅佛像究竟是種樣貌？現已不得而知，我們僅能從現存為數有限的同時期傳

世品，約略想像其風貌。從法隆寺傳世的一批小金銅佛中來看，在六至七世紀，有許多金銅佛像從朝鮮半島被攜至日本，對日本的佛像製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法隆寺的傳世金銅佛有四十九件、共五十七尊，從造型、風格與鑄造技法來看，可約略區分為四種，包括「域外傳入造像」、「止利派造像」、「童子像」、「印度風格造像」。其中「域外傳入」中便有幾件被認為產於朝鮮半島、斷代為六至七世紀的造像。⁸

編號N143號的〈如來三尊像〉（圖2），主尊如來佛與兩脅侍菩薩立於蓮瓣形狀的大型背光前，日本稱為「一光三尊」的形式。百濟故都扶餘的佳塔里寺遺址，曾出土與此件如來佛同一類型著衣風格的佛像，可見與百濟佛像之間的關聯。⁹主尊如來佛以較深的刻線表示眉毛、尊像略帶笑容且柔和的面容，都有別於止利派的風格，被認為是來自朝鮮半島的特色。蓮瓣形狀的背光高約48公分，在頭光與火焰紋之間飾有唐草紋及七尊化佛，在其他的百濟背光中亦有近似的例子。¹⁰

編號N196號的〈金銅背光〉（圖3），原有的主尊與脅侍已不存，從背光中央與兩側的插孔位置，可知原為一主尊二脅侍（一光三尊）形式的背光。此件背光相當難得，背面銘刻七行共五十九字的銘文，¹¹且有甲寅年（594）之紀年，可作為此時期明確的紀年作品。根據銘文題記，此尊造像為佛弟子王延孫，為亡故的父母而作。從背光的形式及供養人的資料來看，應是來自高句麗的移民。¹²本件〈金銅背光〉由頭光、身光及外側的紋樣所構成：頭光中央為盛開蓮華，自中央向外呈放射狀紋樣，配置數圈同心圓紋。從頭光上緣的寶珠延伸出唐草紋包圍著頭光，身光兩側以向上伸展的蓮花與花莖為飾，外側的火焰紋以細密的線條表現，火



圖3 韓國 三國時代(百濟) 594年 金銅背光(日本重要文化財) 銅鑄鍍金 縱31, 橫17.8公分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法隆寺獻納寶物N196號 取自長岡龍作編,《日本美術全集·2·法隆寺と奈良の寺院(飛鳥 奈良時代I)》,圖113。



圖4 日本 623年 鞍首止利作 釋迦三尊像(日本國寶) 銅鑄鍍金 主尊高87.5公分 左脅侍高92.3公分 右脅侍高93.9公分 奈良法隆寺金堂 取自奈良國立博物館編,《法隆寺—日本仏教美術の黎明—》,奈良:奈良國立博物館,2004,頁8,插圖2。

焰紋中更有七尊化佛。其構成與形式，基本上與 N143 號的〈如來三尊像〉的背光相當近似；七世紀主流止利風格的法隆寺〈釋迦三尊像〉的背光（圖 4、5），基本上也承襲此一形式。但 N196 號的〈金銅背光〉，外側更多了一圈寶塔與奏樂飛天的透雕裝飾。

編號 N151 號的〈如來立像〉（圖 6）頭小身長，面容略帶笑容，裙襬下方可見兩足。製作技法亦有別於日本的金銅佛像，背後有三個鑄造用突起點，可能產於三國時代的朝鮮半島。

編號 N158 號的〈菩薩半跏像〉（圖 7），

整體光亮奪目，是一件輝煌燦爛的金銅菩薩像。此像作半跏思惟形象，鵝蛋臉，細眼長鼻，手足較長而身體細瘦，上半身未有任何裝飾；類似造型的菩薩半跏像多見於三國時代的朝鮮。此件金銅佛眼角稍上揚，兩邊嘴角微微向上，此種特色亦可見於扶餘定林寺所出土的塑像。¹³

以上金銅佛的例子，透過將文獻記載與傳世文物相互對照，讓我們能夠重新勾勒出佛教初傳日本的一部分樣貌。代表飛鳥時代佛像的法隆寺〈釋迦三尊像〉（見圖 4），採一主尊二脅侍（一光三尊）形式，臉型頰長，嘴角泛出神秘的微笑，強調正面觀看的對稱性與衣紋折



圖5 日本 623年 釋迦三尊像背光（正面細部） 法隆寺金堂藏 取自長岡龍作編，《日本美術全集·2·法隆寺と奈良の寺院（飛鳥・奈良時代1）》，圖12。

線，這些特徵亦可見於朝鮮三國的佛像。

大和朝廷對佛教傳入的態度

而百濟使節向大和朝廷贈予佛像時，有如下表示：

別表，讚流通禮拜功德云：「是法，於諸法中最為殊勝，難解難入，周公、孔子尚不能知。此法，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，乃至成辦無上菩提。譬如人懷隨意寶、逐所須用、盡依情，此妙法寶亦復然，祈願依情無所乏。且夫遠自天竺爰洎三韓，依教奉持無不尊敬。由是，

百濟王、臣明，謹遣陪臣怒唎斯致契，奉傳帝國流通畿內。果佛所記我法東流。」

—《日本書紀》〈卷第十九·欽明天皇紀〉

由上述可知，百濟使者之所以宣揚佛教，一是佛法的至高無上，連儒家的聖人尚且未能得知；二是為了佛法所能帶來的功德與利益。

另一方面，欽明天皇對於百濟遣使特意致贈的佛像佛法，又是抱著什麼樣的想法呢？從其回應中也可一窺飛鳥人初識佛教的想法。《日本書紀》〈卷第十九·欽明天皇紀〉記載：

是日，天皇聞已，歡喜踊躍，詔使者云：

「朕從昔來，未曾得聞如是微妙之法。然朕不自決。」乃歷問群臣曰：「西蕃獻佛，相貌端嚴。全未曾有，可禮以不。」

值得注意的是，欽明天皇除了同意百濟使者對佛法的推崇，認同讚嘆佛法的高深之外，天皇還著眼於佛像「相貌端嚴」的外觀。很顯然地，佛教傳入日本之始，吸引時人的除了教義與思想的啓迪，更有訴諸視覺感官所帶來的新鮮體驗。除了宗教本身伴隨著的神祕力量之外，佛教傳入日本之初，在當時的飛鳥人眼中，更接近一種新的視覺文化所帶來的衝擊。飛鳥人所理解的佛教，或許就是對帶有神祕之美的佛像，進行種種的祭祀與禮拜行爲。¹⁴

在上述引用的《日本書紀》中，欽明天皇雖對於佛教之新奇多感驚艷，但是對於是否接納佛教，仍有疑慮，故詢問朝臣意見。《日本書紀》〈卷第十九·欽明天皇紀〉記曰：

蘇我大臣稻目宿禰奏曰：「西蕃諸國一皆禮之，豐秋日本豈獨背也。」物部大連尾輿、中臣連鎌子同奏曰：「我國家之王天下者，恆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，春夏秋冬祭拜爲事。方今改拜蕃神，恐



圖6 韓國 三國時代(百濟) 6世紀末 如來立像(日本重要文化財)銅鑄鍍金
高33.5公分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法隆寺獻納寶物N151號 取自水野敬三
郎等編,《日本美術全集·2·法隆寺から藥師寺へ—飛鳥・奈良の建築・彫
刻》,圖34。

致國神之怒。」天皇曰：「宜
付情願人稻目宿禰試令禮
拜。」大臣跪受而忻悅。安
置小墾田家，勲修出世業為
因。淨捨向原家為寺。

文中「蘇我大臣稻目宿禰」，即蘇我稻目(?-570)；蘇我氏為當時有力氏族之一，由於對朝鮮的顯著外交功績而興起。在文中蘇我稻目認為，西邊諸國皆崇尚佛教，日本也不應置身事外；展現了對於接納佛教的積極態度。但其他兩位採取排佛立場的大臣物部氏、中臣氏卻認為，日本自古以來即有神明(文中稱為「國神」)護佑，若貿然信奉外來之神，恐怕會招致本土神明的憤怒或災禍。最後由欽明天皇裁決，將佛像交由認同該信仰的蘇我稻目，供奉於其私人宅邸中。

以上的記述，不但可解讀為崇佛與排佛的兩派，在朝廷中的政治角力；同時也是各自對本土信仰(國神)與外來信仰(蕃神)的擁護。物部氏、中臣氏等傳統豪族認為，在不能確定「蕃神」所帶來的利益或果報時，實在不宜輕易的奉祀「蕃神」，以致失去原有「國神」的護祐。而雖說佛教傳來是由於朝鮮半島的情勢不穩，但畢竟還不到對日本有直接威脅的地步。而欽明天皇身負國家祭司身分，從其立場而言，實不宜貿然將外來信仰提升至國家層級；但另一方面，單獨允許蘇我氏禮佛一事，亦考慮到蘇我

氏背後的百濟勢力、以及與其之間的外交關係。

另一方面，根據《日本書紀》記述，佛教公傳是年（另一說為欽明天皇三十一年，即570年）疫病流行，主張排佛的物部尾輿等人，將佛像流棄難波堀江，並焚毀佛寺，公然廢佛。可見於《日本書紀》〈卷第十九·欽明天皇紀〉：

於後，國行疫氣，民致天殘，久而愈多，不能治療。物部大連尾輿、中臣連鎌子同奏曰：「昔日不須臣計，致斯病死。今不遠而復，必當有慶。宜早投棄，懇求後福。」天皇曰：「依奏。」有司乃以佛像，流棄難波堀江。復縱火於伽藍，燒燼更無餘。於是，天無風雲，忽炎大殿。（圖8）

結局：崇佛派的勝利

在崇佛與排佛之爭後，佛教在日本的有力氏族間仍徐徐發展，蘇我一族可說是其中的關鍵力量。藉著百濟、新羅所遣來的僧人、典籍、佛像、營造工匠等，蘇我氏所主導的佛教在形式與內容上日益充實；但此時的佛教，仍停留在個人或特定氏族的信仰，並未得到朝廷的全面承認。此一情形直到佛教公傳後約半世紀，用明天皇（585-587在位）



圖7 韓國 三國時代 6~7世紀 菩薩半跏像（日本重要文化財） 銅鑄鍍金 高20.4公分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法隆寺獻納寶物N158號 取自水野敬三等編，《日本美術全集·2·法隆寺から藥師寺へ——飛鳥・奈良の建築・彫刻》，圖3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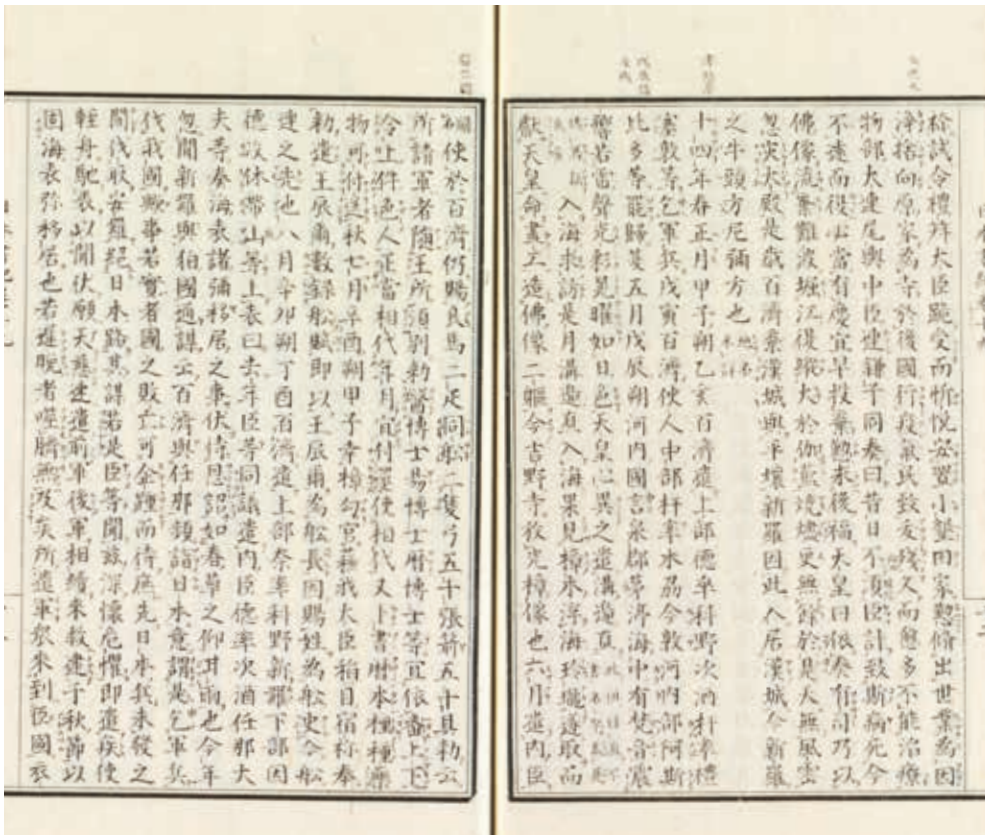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(日) 舍人親王編 《日本書紀》第四冊 卷19 日本明治十六年佚存書坊石印巾箱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012013



圖9 6世紀後半 蓮華紋瓦當 直徑16.1公分 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藏 取自水野敬三郎等編，《日本美術全集·2·法隆寺から藥師寺へ—飛鳥・奈良の建築・彫刻》，頁140。

時才得以轉變。

用明天皇二年（587）四月，用明天皇身染重病，決意皈依三寶，並徵詢群臣意見。此時的蘇我氏與物部氏仍各自秉持著其一貫的「崇佛、排佛」立場，但兩派的矛盾迅速地激化。用明天皇死後，雙方各自擁立不同的天皇人選，發生嚴重的軍事衝突。最後是崇佛派的蘇我馬子（?-626，蘇我稻目之子）及其支持的炊屋姬（其後的推古天皇，592-628 在位），集結了眾多豪族的勢力，獲得最終的勝利，殲滅了排佛立場的物部守屋等人與其擁戴的穴穗部王。

這場戰役決定了蘇我馬子等崇佛派的勝利，以及大和朝廷對佛教的公認立場。雙方征戰結束後，蘇我馬子旋即於崇峻天皇元年（588），開始建設日本最初的正規寺院——法興寺（即飛鳥寺），帶動了其他有力氏族們競相興建佛寺的風潮。同一年有包括造寺工、鑄造工、瓦工（圖9）、畫工的八位專業人員從百濟來到大和朝廷，負責建築用材的準備與調度。在佛教公

傳半世紀後，日本來到了營造正規佛教寺院的階段。根據考古學的發掘調查，大和、飛鳥一地建於六世紀末至七世紀中期的佛寺，約有將近五十座，相當接近《日本書紀》中的記載。推古天皇並於594年（推古天皇二年）下達「三寶興隆」詔書，日本開始了最初的佛教文明——飛鳥文化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

註釋：

1. 「二年，夏六月，秦王苻堅遣使及浮屠順道送佛像經文，王遣使迎謝。」典出（高麗）金富軾，《三國史記》（京城府：朝鮮史学会，1928），卷18，〈高句麗本紀第六·小獸林王〉，頁3。
2. 可見於久米邦武（1839-1931）、津田左右吉（1873-1961）等日本近代歷史學家的研究。
3. 根據《日本書紀》所記載的欽明天皇在位期間（539-571）並無戊午年，日本學者以最接近其在位期間之戊午年，判定為文獻記載該年。即欽明天皇即位前一年（538年，宣化天皇三年）。
4. 相關史料如記載飛鳥寺建寺原由的《元興寺伽藍緣起并流記資財帳》、聖德太子最早的傳記《上宮聖德法王帝說》等。對於相關史料的檢討，可見吉田一彥，〈仏教の伝来と流通〉，《新アジア仏教史・11・日本Ⅰ・日本仏教の礎》（東京：佼成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42-47。
5. 有學者考證《日本書紀》中所敘述的佛教公傳，發現其中的文句大部分節錄、仿效自佛經與典籍的內容（例如《金光明最勝王經》、《高僧傳》等）；而且書中對佛教傳至日本後的敘事模式，應是參照中國佛教的實際發展模式重構而成；即以北周至隋「末法、廢佛、護佛、振興佛教」的歷程，轉化為《日本書紀》中「末法之世佛教傳來、朝廷廢佛、氏族廢佛與護佛之爭、聖德太子振興佛教」的模式。見吉田一彥，〈仏教の伝来と流通〉，頁26-42。
6. 田村圓澄，《仏教伝来と古代日本》（東京：講談社，1986），頁45-47。
7. 「第七代繼體天皇即位十六年壬寅，大唐漢人案部村主司馬達止，此年春二月入朝。即結草堂於大和國高市郡坂田原，安置本尊，歸依禮拜。壬世皆云，是大唐神之出緣起。隱者見此文，欽明天皇以前，唐人持來佛像，然而非流布也。」典出黑板勝美校訂，《國史大系·第六卷 日本逸史 扶桑略記》（東京：經濟雜誌社，1897-1901），卷3，「欽明天皇一三年」條，頁483-484。
8. 岩佐光晴，〈四十八体仏の世界〉，收入長岡龍作編，《日本美術全集·2·法隆寺と奈良の寺院（飛鳥・奈良時代Ⅰ）》（東京：小学館，2012），頁204。
9. 岩佐光晴，〈四十八体仏の世界〉，頁204。
10. 大西修也，〈図版解説〉，收入水野敬三郎等編，《日本美術全集·2·法隆寺から薬師寺へ——飛鳥・奈良の建築・彫刻》（東京：講談社，1990），頁206。
11. N196號〈金銅背光〉背面銘文：「甲寅年三月廿六日。弟子王延孫奉為現存父母。敬造金銅釋迦像一軀。願父母乘此功德。現身安穩。生生世世。不經三途。遠離八難。速生淨土。見佛聞法。」
12. 大西修也，〈図版解説〉，頁207-208。
13. 岩佐光晴，〈四十八体仏の世界〉，頁206。
14. 本郷真紹，《和国の教主・聖德太子》（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2004），頁62-63。

參考書目：

1. 田村圓澄，《図説 日本仏教の歴史 飛鳥・奈良時代》，東京：株式会社佼成出版社，1996。
2. 曾根正人，〈日本仏教の黎明〉，收入森公章編，《日本の時代史·3·倭国から日本へ》，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2002，頁162-185。
3. (日) 舍人親玉編，《日本書紀》，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，《域外漢籍珍本文庫》，輯4，2:1，重慶：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；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3。